

贫困地区教育水平经济收益的实证分析

陆杰华

摘要 在对现有国内外有关教育水平的经济收益文献进行回顾以及构建个体接受基础教育的一般决策模式的基础上,利用了贫困地区的调查数据对农民基础教育水平的经济收益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如果按不同教育水平的综合经济收益分析法,贫困地区同样存在着教育收益率递减的现象;而根据年龄分组来评价教育水平的经济收益状况,其教育收益率递减的现象正在逐步消除,这对于提高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作者 陆杰华,男,1960年生,1997年获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教授。(北京市 100871)

教育本身是一种投资,无论对国家或者个体而言,对教育的投入是期以产生未来的经济收益,因而对经济收益的追求是教育投入的最重要的驱动力。由于教育投入的经济收益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因此个体在做出是否接受基础教育或者接受何种层次基础教育的决策时,更多关注的是周边人们教育的经济收益状况。众所周知,我国贫困地区农民整体的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于是我们所关注的焦点有两个:其一是贫困地区农民较低的教育水平是否与其较低的经济收益相关;其二是贫困地区是否也存在着教育收益率递减的现象。本文利用四个贫困县的动态调查数据、以个体为单位考察正规教育的经济收益现状,以便能够对上述问题有一个客观的回答。

一、相关研究的回顾

无论从宏观上,还是微观上看,基础教育都不仅仅是一种消费形态,即获得必要的正规教育是获得满足或者某种效用性;相反,就社会和个体而言,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人们未来领域中的生产力存量。未来领域包括自我就业能力、家庭经济活动方式、消费满足程度及未来收入水平等。^[1]Becker 则从微观上分析了个体正规教育与其收入效应之间的关系。^[2]人们在接受正规教育时有时可能牺牲一些收入,他们此时的收入比同龄不接受正规教育者要少,这种能够得到的收入与实际得到的收入(包括过去处于闲暇的价值)之间的差额是一种重要的正规教育的间接成本;而学费、书籍、各种供给以及交通与住宿支出是另一种更直接的成本。世界银行则通过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资料显示,各级正规教育的收益率是相对比较高的,特别是对小学教育而言更是如此。例如,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小学教育收益率是 24.2%,初中教育的收益率为 15.4%,而高中教育的收益率为 12.3%。表明小学教育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具有极大吸引力的投资机会。^[3]此外,大量实证研究也证明:父母教育程度与子女教育程度是呈正相关关系。

前面的国外研究说明教育水平的提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个体的经济收入水平。不过,许多实证研究表明,中国不同教育的收益率却并不像外国学者所预计的那么高,在某些地区或行业甚至出现了文化程度较低者,其经济收益率大于文化程度较高者的现象。例如,诸建芳等人利用 12 个省份企业职工调查资料研究了男女职工受教育年限与其平均年收入之间的相关关系,他们发现,就同等教育程度者而言,男性平均年收入均

高于女性,表明男女收入水平不平等境遇依然存在;而就不同受教育程度者,高小的平均年收入最高①,为2928元;此外,高中毕业与初中毕业者的平均年收入之差仅为63元,而前者却比后者要多受8年的正规教育。^[4]这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我国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脑体倒挂”现象。

同样,一些实证研究也发现,如果以初中教育的收益为1,我国的国民基础教育接受对象则存在着教育收益率递减的现象,如高中毕业、大学毕业、硕士研究生的收益为0.79、0.46和0.47。此外,韩常森^[5]通过对北京市同工龄不同文化程度职工人均月收入对比的数据分析发现,同工龄的职工中,初中和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职工收入水平要比中专和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收入水平高25%,而且工龄越小,其收入差异水平越大。

客观地讲,目前学术界对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之间关系的探讨大多未考虑年龄的因素,因而有可能产生“脑体倒挂”的假象。本文在后面教育水平的经济收益分析中将考虑年龄因素对收入水平的影响,以便能够更客观地评估我国教育水平的经济收益状况,弥补这方面研究的局限性。

二、个体接受基础教育层次的一般决策模式

在探讨贫困地区教育水平的经济收益之前,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个体在选择不同基础教育层次时的决策动因。从微观上讲,个体在选择是否接受基础教育或受教育的程度上,一般都根据自身对教育效用的认识、家庭(特别是父母)对个体基础教育的期望及社会对教育接受者的奖赏来作出选择与判断,这三个方面是一个多维的结合体,具有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特性。

事实上,个体在选择是否接受基础教育或受教育的程度过程中面临着或多或少的决策点,这种决策点可以说存在于整个国民基础教育体系中的任何一个时点之中。为了比较明确地反映出个体在选择基础教育层次上的一般决策过程和对贫困地区的辍学率较高现象做出一般理论的解释,我们利用图1简单地描述两阶段基础教育层次的决策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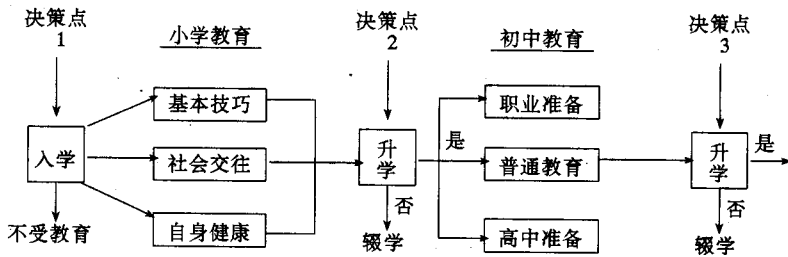


图1 简单的两阶段国民基础教育选择的决策模式

例如,个体在最初选择是否接受小学教育的时候,其决策的过程更多受家庭的期望所影响。如果家庭期望他具有必要的基本技能、简单的社会交往能力和通过获得知识使自身健康发展,他便可以接受小学教育,否则他就不会接受教育;同样,个体在选择初中教育程度上,也遇到类似的决策点。如果他或者家庭希望为未来职业或升入高中作准备,他或者家庭希望他具有普通教育水平,他便决定升入高中,否则他便决定辍学而走上工作岗位。个体在选择升入高中或大学或更高教育层次上,也面临同样的决策点,只不过是个体或者其家庭对更高层次基础教育的认识或者期望存在一定差异而定,或者说这种决策点更多地受着社会对不同教育程度者奖赏的影响。应当申明的是,图1所标明的决策点只是为了简单明了地说明问题而设立的,事实上,个体在整个国民基础教育体系中时刻面临着决策的微观选择,这些决策点贯彻于整个国民基础教育体系中任何一个时点上。同时,还要申明的是,个体接受教育的程度也受着宏观教育成本-收益现状的影响和微观经济状况的制约。

三、调研县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了辽宁省凤城满族自治县(现已撤县改市,为凤城市)、山西省代县、河南省商城县和广西壮族自治区

① 初小毕业的受教育年限为4,高小毕业、初中毕业和高中毕业的受教育年限分别为6年、9年和12年。

治区龙胜各族自治县为调研县。本文研究的数据资料来源包括两部分:(1)1990年四个调研县千户家庭抽样调查资料,这次抽样调查的内容信息丰富,是迄今为止全国最大规模的贫困问题专项调查。(2)1996年凤城和龙胜两个调研县各200户追踪调查资料。1990年至1996年是中国反贫困成效比较显著的一个时期。为了全面反映这一时期贫困地区农民个体不同教育水平的经济收益变化以及结合本文研究内容的重点,笔者于1996年8月间对凤城县和龙胜县进行了各200户的家庭问卷典型调查,以便能够全面对农民教育水平的经济回报进行动态比较分析,为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发展提供理论的依据。

四、不同受教育水平的综合经济收益分析法

如我们前面的文献回顾所述,人们通常利用个体教育水平和其经济收入水平资料来分析不同受教育水平的经济收入差异状况。由于1990年四个调研县的千户抽样调查资料中未对个体的经济收入状况加以统计,而仅有家庭毛收入指标,我们因而通过户主文化程度与其家庭人均毛收入的资料来间接分析不同户主文化程度的家庭人均收入的差距。我们这种分析的主要假设是,户主的文化程度基本上代表了家庭对某一层次基础教育的认同;同时,户主的收入水平与家庭的平均收入水平大体吻合。

表1显示出调研县按文化程度分的户主经济收益水平。表1中的数字是不同文化程度者的经济收益系数,其计算方法是首先计算出不同文化程度者的平均收入水平,然后以初中的平均收入水平为分母,计算出不同文化程度者的收益系数。从表1不难看出,调研县也普遍存在着教育投入的经济收益递减现象(凤城除中专和高中受教育者外)。例如,代县高中受教育者的收益系数为0.83,与小学受教育的收益系数(0.79)不相上下。

表1 调研县按文化程度分的户主经济收益状况

	凤城	代县	商城	龙胜
大学	0.7	0.65	NA*	1.19
中专	1.30	0.58	0.68	0.86
高中	1.81	0.83	0.81	1.17
初中	1	1	1	1
小学	0.72	0.79	0.59	1.08
文盲、半文盲	0.77	0.64	0.44	1.01

* NA表示这一栏没有观察值。

同样,我们通过户主受教育年限与其家庭人均毛收入资料进一步深入探讨不同受教育年限者的经济收益差距(与文化程度的经济收益系数所不同的是,教育年限的经济收益系数是以九年受教育者的平均收入水平为权数而计算的)。我们的计算结果表明,除个别年限以外,调研县户主不同受教育年限的经济收益系数呈倒U字型,这至少包括两个内涵:其一,如果以初中文化程度的经济收益为对照组,文化程度越高者,其经济收益则越低,说明同样存在着教育水平的经济收益递减现象;九年义务教育临界点两侧经济收益差距较小状况有可能驱使农民放弃初中教育或更高层次的正规教育。其二,九年正规教育受益者的经济收益基本是最大的,可以说是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经济收益的最大临界点,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贫困地区普及初中教育的长远受益者将是农民个人。

正如前面所述,同等受教育的男女,其经济收益有很大差异,贫困地区也是如此。我们利用凤城和龙胜1996年追踪调查资料来分析男女受教育的经济收益差距状况。通过分析发现,凤城男女初中、小学和文盲、半文盲受教育者的经济收入之比分别为1.87:1、1.99:1和0.80:1,同等受教育者,男性的收入水平远高于女性;而龙胜男女同一指标分别为1.35:1、1.23:1和1.45:1。

五、不同受教育水平的经济收益的年龄分组分析法

前面对个体教育水平与其经济收入之间关系的分析可以粗略地勾划出个体教育投入—产出的收益状况,不过,这种分析方法存在着一个明显不足,即它没有考虑到年龄对个体经济收入水平的影响。一般来说,随着年龄的增加,个体的阅历、技术专长也随之增加,因而增加个体经济收入的因素不仅是教育水平,年龄也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为了分离年龄和文化程度对个体收入的影响,我们利用年龄这一人口学常用的标志来

分组,即将人口按年龄标志划分为若干个组,以观察他们教育水平和其经济收入之间的内在联系。

我们首先将成年人口按十岁一组划分为 15~24 岁、25~34 岁、35~44 岁、45~54 岁、55~64 岁五个队列,然后来分析每一年龄组不同文化程度的经济收益状况。我们的计算结果与前面教育水平的综合经济收益分析方法有着明显的差异,即随着年龄的降低,各调研县正规教育的经济收益状况正趋于向合理性方向发展,也就是说,对于低年龄组者而言,文化程度越高,其经济效益系数越大(代县除外)。例如,商城 15~24 岁年龄组高中、初中、小学和文盲、半文盲的经济收益系数分别为 1.25、1、0.75 和 0.62,表明随着户主文化程度的提高,其经济收益也在稳固的递增。毋庸置疑,这将为贫困地区提高整体文化素质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氛围。

我们同样利用 1996 年追踪调查资料分析年龄和文化程度对个体收入的不同影响(见表 2)。结果表明,龙胜各年龄组不同文化程度者的经济收益出现了随文化程度升高,其收益增加的倾向;而凤城各年龄组虽没有出现教育收益率递增的现象,但是同一年龄组内,初中和小学受教育者的经济收益有着随年龄降低,其收益差距加大的趋势,这或许驱使更多的农民做出接受初中教育的决策,这同样是普及贫困地区初中教育的一个良好征兆。

表 2 凤城和龙胜按年龄和文化程度划分的个体经济收益状况

	凤 城				龙 胜			
	高中	初中	小学	文盲半文盲	高中	初中	小学	文盲半文盲
15-24	NA*	1	0.15	NA	1.13	1	0.79	NA
25-34	0.7	1	0.32	NA	1.14	1	0.76	0.52
35-44	NA	1	0.72	NA	1.92	1	0.93	0.61
45-54	NA	1	0.32	0.47	NA	1	0.83	1.00

*NA 表示此栏没有观察值。

六、结论与讨论

分析结果表明,如果按不同受教育水平的综合经济收益分析法来评价贫困地区农民个体的教育水平经济收益状况,贫困地区同样存在着教育收益率的递减现象,特别是对于受过高中或者更高教育的农民而言更是如此,这种状况是与教育经济学中的教育高投入-高产出的理论相矛盾的,也不利于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健康发展,因为贫困地区教育收益率的递减现状有可能驱使一些农民放弃高中或者更高的教育层次,这也从另一方面助长了农民长期以来形成的“种田人读书无大用”的思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贫困地区男女受教育者的经济收益差异的现状将会更加减弱对女性受教育的需求,这也是贫困地区女性辍学率较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过,如果我们引入人口学中常用的年龄变量,通过年龄分组来考察不同受教育水平的经济收益状况,我们发现,贫困地区存在的教育收益率递减现象在逐步消除。因而,我们认为,发展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关键要素之一是通过改变个体教育投入与其经济收益不平衡状况来影响农民受教育的态度与行为,特别是利用扶贫资金鼓励或扶持接受过良好正规教育的劳动者,学习和应用较为先进的农业实用技术,以促使他们尽快富裕起来,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这样才能在贫困地区创造出人人重视基础教育的良好氛围。

参考文献:

- 1 Schultz, T. W. Investing in People: Economics of Population Quali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 2 Becker, G. S.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 3 World Bank. World Bank Report, 1980. 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1980
- 4 诸建芳等. 中国人力资本投资的个人收益研究. 经济研究, 1995(12)
- 5 韩常森. 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收入倒挂, 有碍人口文化科学素质的提高. 人口研究, 1989(4)